

➡➡黄牛们三五成堆,手里拿着要开场的电影票,卖给要看电影的人。当然他们经营的不单单是电影票,凡是大家需要的他们手里都有。

●黄牛一词始出原因谁也不说清,但这个名词很响,也存在了很久。就连“文革”时,在万木萧疏、万物凋敝时,黄牛们仍活跃在各个领域,显出他们的牛势和灵气。

上海黄牛的出现,据说是在 1843 年,英国首任上海领事巴富尔初到上海,借得上海一个姚姓商人的房子共 52 间,于是把妻子等人都安排在上海老城厢里生活。那时候的上海人第一次看见高鼻子蓝眼睛的人,特别是女洋人们,挺胸抬头,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立刻引来了上海人的好奇,于是每天有很多人在洋人居住的房子前争相看热闹。

这时候,一个具有小聪明的上海人,就动了一个脑筋,他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了一根线,让大家沿着这根线排好队,每人出一文钱就能走上去,近距离看洋人。后来看洋人的越来越多,排在后面的人就是出了一文钱也要很晚才能排到队伍前面看,于是,那个小聪明的上海人就把前面队伍中的位子高于一文钱出手转让给后面的人,也许这就是上海出现的第一个黄牛吧?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周立波“笑侃上海三十年”中对黄牛的一个模仿,俗称“打桩模子”。但有小聪明的上海人经营的并不只是黄牛这个行当,黄牛也并不都是站在宾馆门口贩香烟,而是只要有钱赚他们就做。

比如,上海滩有名的跑单帮,又叫投机倒把。在我们小时候就流行着这样一句上海歌谣:“同志们,捉牢伊,投机倒把贩卖拉斯蛤把。”那意思就是,同志们要捉的那个伊,某一天在池塘里捉到几只蛤蟆,可他舍不得吃,就拿着蛤蟆来到了城里卖给想吃的人, 换点钱在城里买几尺花布或是热水瓶、毛巾带回乡下。但那时候,没有自由贸易市场,伊只好拎着蛤蟆出没在上海弄堂里,小心地问人家:“拉斯蛤把要哦?”

最早我们看样板戏《沙家浜》,胡传魁问阿庆嫂:“阿庆呢?”阿庆嫂答:“到上海跑单帮去了。”

知道吗?在抗战这个最艰难的期间,常熟人也要跑到上海来做单帮呢。当然,阿庆来上海跑单帮是根据季节来跑单帮的,比如到了吃大闸蟹的时候,阿庆肯定会把阳澄湖上的蟹带到上海,然后换成了伤病员需要的药回到沙家浜。足见“跑单帮”在那个时代是起到了物质和资金的流动作用。

“跑单帮”是旧时对从事异地贩运做小本生意的人的一种称呼,就是现在北方人统称的倒爷。但那时候“跑单帮”的不是“爷”,而是生活在低层的那些爷叔阿姨们,为了弥补日常生活中的欠缺千里迢迢跑起单帮。

我妈就跑过单帮。那时我每年会跟着母亲去宁波乡下,去的时候,母亲让我穿一件大人的衣服,衣服上用大头针别着一盒盒自来火,然后再在外头罩一件更大的衣服。现在想想,我这个动作就像中东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身上绑着炸药,只要有人在我身上点一根火柴,我就会全身燃烧。但那时,我一点也不怕,为自己能帮上母亲,把乡下头需要的自来火带给他们而感到自豪。

这些自来火是母亲用家里的白糖票暗地里和人家换的,我记得母亲曾用布票换粮票,再用粮票去买各种好吃的糕点带到乡下去。乡下有我的阿姨,当年我母亲来上海时,她因为要照顾外公,所以留在了宁波乡下。母亲总觉得亏待了自己的妹妹,所以,每次去宁波看我阿姨时,总是大包小包的,把阿姨需要的东西带给她。当然,阿姨也是给母亲有回报的,把乡下的糯米做成了各种各样糕,把蚕豆晒干,芝麻炒熟,统统放在几只火油箱里带回上海,母亲再转手卖给需要的人,把赚来的钱再为我们付学费,买新书包和做新衣服。

●后来,阿姨也跑起单帮。她来上海买香烟,把劳动牌香烟和牡丹牌香烟带到乡下,据说价格能翻个倍。为了能让阿姨赚钱,我们全家出动,把附近的烟纸店都跑遍。那时候香烟是没有整条买的,最多能买五包,但阿姨回乡下时,她的那只旅行包还是装满了香烟。再后来,阿姨再把上海的电视机搬到了乡下,转手也卖了。当然,阿姨来上海时会带上自己从山上采来的茶叶,这种茶叶叫高山茶,喝在嘴里第一口有点苦,再喝第二遍时就生津回味。为了帮阿姨把茶叶卖掉,我和母亲就拿着茶叶去虹口公园卖,专门找那些在公园里打太极拳的老人们推销。哎,这个茶叶生意还是不错的,我们带去的都被大家买光了,还问下次什么时候有。

就在大家对茶叶赞叹时,公园里的纠察来了,说母亲是投机倒把,要把茶叶充公。但我们的茶叶都到了别人的手里,于是纠察要充公我们的钱。我见有人要来没收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时,不管三七廿一,拎着放钱的包就跑了起来。纠察没有注意到我这个小孩子,还以为我是练晨跑的,就缠着我母亲不放。母亲见我带着钱包逃走了,她的胆子也大了,毕竟她是跑过宁波码头的,是属于见过世面的,于是,母亲就大声叫嚷:“啥人卖过茶叶了?”好在那些老伯伯们也帮忙,都说这茶叶是母亲让他们品尝的。

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纠察的厉害,但最厉害的还是那次在宁波轮船上,那几个纠察叫我终生不忘。

去宁波总是老规矩,我会穿上一件大人的衣服,只是这次我身上带的是香烟,母亲把香烟拆零,塞在衣服的缝缝里,我安静地坐在船舱里。这时候,有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走进船舱,说要给小朋友们打针,说船上空气不好预防传染病。我见医生走进来,以为有宝塔糖吃了,就高兴地挽起衣袖准备给医生打针。但医生要我脱衣服,说是打在屁股上的。

这时母亲却慌了,她说我前几天屁股上生了个脓疮,最好别打针了。医生听了就冲着我笑笑,说那就打在上臂上吧。我就把胳膊伸到医生面前,对他说:“依打得轻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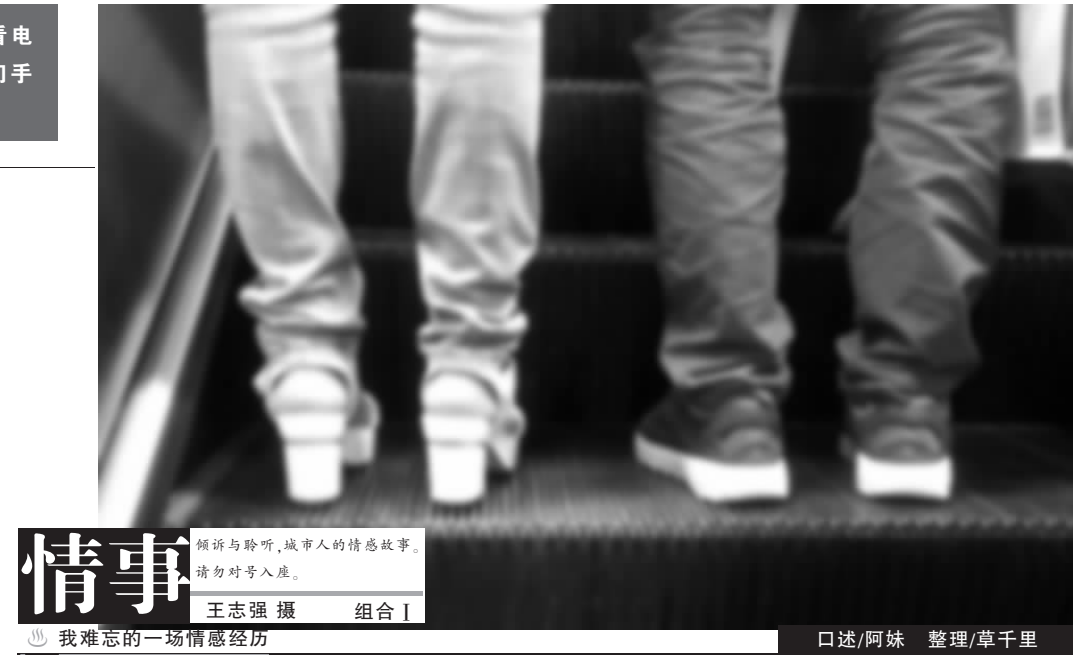
针打好了,宝塔糖也吃了,母亲却心事重重,生怕医生在打针时,发觉了我身上的东西。但我是小人,一点心事也没有,一边吃着宝塔糖一边哼着:“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就在这时,船舱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只听见有人在大叫:“捉投机倒把的,那个人身上绑着香烟。”

我和母亲一听,顿时依偎在一起,大气都不敢出一声,难道刚才那个医生发觉了我们,叫纠察来抓我们了?我靠在母亲的身旁,她浑身发抖,但双手紧紧抓住我的小手,她怕我会哭出声来。这时候,我却眼睛睁得圆圆的,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谁敢来没收我们的香烟,我就咬谁的手。

这时候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我们的船舱边走过,只听那些人说道:“那个女人跳海了。”

母亲一听,立刻把我紧紧抱着,我听到了她的心跳声。后来我们才知道,在统舱位里,有个穿着棉大衣的女人,裹着很多条香烟,被邻近的乘客发现了,就向船上的纠察报告了。当纠察要没收这个女人身上的全部香烟



那些黄牛们和跑单帮的

时,她就拼命地向船头奔去,纠察在后面追。那个女人见纠察追上来,自己也没有退路了,就跳进了滚滚的大海。她带着身上的香烟也带着她的希望投入了大海。

从此以后,母亲和阿姨都不跑单帮了,还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为宝贵呢?

●但黄牛在我的记忆中还是很亲切的,因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通过黄牛能得到我们需要的东西。而最让我迷上黄牛的是在电影院门口换年历片。

那是刚刚改革开放,上海年历片厂印出了一套以云南茶花图案为主打的十二张年历片,制作精美,图案鲜明。我拿到一张,是朵玫瑰花。当我拿到这张年历片时,就如闻到了花香,爱不释手。于是,我就动脑筋,想把这十二张图案的年历片收齐。那时候我已经工作了,手里头有点小钱,但有钱不一定能办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于是,我就去找黄牛们。

那时候的黄牛们都分散在电影院门口,特别是四川北路上的永安电影院门口,黄牛们三五成堆,手里拿着要开场的电影票,卖给要看电影的人。当然他们经营的不单单是电影票,凡是大家需要的他们手里都有。

我对黄牛说,我要十二张年历片,一共是十二朵花。那个黄牛年纪和我差不多,穿着一件从南京西路“人立”店买来的茄克衫,头发梳成三七开,一条长长的西裤拖到地面上。这是上海滩最流行的行头,也是黄牛们的统一装束。那个黄牛见我一个人来,就问我看电影要看吗?说永安电影院正在放王心刚和王晓棠主演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他原价卖给我。我说我要年历片,他却笑着叫我去看电影,看好了再来拿年历片也不迟的。我想想也有道理,再说我很喜欢看王心刚和王晓棠演的电影,特别是王心刚的帅劲儿,让我们那个时候的年轻人都痴迷。于是,我买了张电影票进去看了。

电影看好了,我再去找黄牛,他却对我说,这个年历片太紧张了,只搞到十二张一模一样的图案。我说我要十二张一模一样的图案干吗?黄牛却对我眨着眼睛说道:“小姑娘笨来,不好拿年历片去和人家调换吗?你有的,别人不一定有,他有的也许正是你要的。”

经黄牛一说我顿开茅塞,于是高高兴兴地把十二张一样的年历片买了下来,然后按他的指点和单位同事换,果然,我用同样的图案凑齐了我需要的年历片,成了当年最牛的年历片收集者。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弄堂口也出现了一个黄牛。他叫刘伟军,是老三届知青,因为他腿脚不便去不了农村,就一直病退在家。当形容容许经济市场出现时,刘伟军就在弄堂口摆了只箩筐,箩筐上贴着一张用毛笔字写好的纸条:收购华侨券、香烟票、兑换券、粮票、鸡蛋券……刘伟军的箩筐就如经济市场上的晴雨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他的纸条也在不断地变化,没有几天工夫他也收购国库券、电视机票和手表票。他自己就坐在过街楼底下,泡壶绿茶,一边和邻居打着四十分,一边和人吹牛皮,听到有人来找他了,他就放下手中的牌,把来人带到自己家里进行交易。

刘伟军就靠着这个箩筐,讨进了老婆。他的老婆长得很漂亮,新娘子嫁进来时,搞得一条弄堂里的男人心里很不平衡,凭啥我们好手好脚却讨不到这样漂亮的女人?但这个漂亮的女人在为刘伟军生下孩子后就吵着要去日本了,于是,刘伟军利用自己是黄牛的身份为她凑满了去日本的日元,并亲自把她送上飞往日本的飞机。

同时,他心里很明白,这个女人已经不属于他了。

●但刘伟军还是做黄牛,他是弄堂里第一个买商品房的人。每天他骑着摩托车从新房子那里过来,仍旧坐在过街楼底下,手里捧着一把紫砂壶,两只眼睛死盯着那个箩筐看。听说到现在,刘伟军还在摆箩筐,只是箩筐挪了地方,箩筐上的纸条内容变了。有次我去四川路上办事,在一家书报亭里,看到了一只箩筐,上写着“无抵押贷款,50 万立马放贷”。我觉得这字迹很熟悉,但不见刘伟军的影子。于是,我就去问书报亭老板,这个箩筐是谁的?那个老板见有人打听这个箩筐,就用警觉的眼神看着我。我就对他笑笑,买了一份报纸就走了。但走了没多久,又看见几只箩筐,贴着用黑字写的纸条:“收购杏花楼月饼票,克莉斯汀、可颂坊面包券,来伊份,交通卡。”这些字迹我十分熟悉,难道这些都是刘伟军写的?

正当我疑惑时,一辆帕萨特 2000 停在我面前,只见车窗慢慢摇下,一只光头出现在我眼前,他朝我笑笑。我认出了刘伟军,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某某典当,他是这家典当的大股东。

刘伟军看见我十分热情,邀请我在他的帕萨特里坐一坐。我想到他的腿不是很利索,就坐在他的副驾驶旁。好多年不见,他发胖了,油光光的头皮散发着古龙香水的味道。他告诉我又找了个外来妹做老婆,比他小十八岁,前阶段还生了大胖侏子。他说的时候脸上都是笑容,一口一声说改革开放就是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一辈子是个穷光蛋。当他听说我手里有大量美金时,就对我说:“阿妹,趁现在美金高位快眼抛掉,美金在手里会贬值的。”我问他:“美金抛了买啥能保值呢?”

他眼睛眨也不眨地用坚决的口气说道:“买房子。”我说:“房子已经高位了,我买不起。”

“阿妹依真蠢,现在买二手房最合算了。依要,我手里就有一套二手房,我一点也不赚卖给依。”没有想到刘伟军这个黄牛又倒卖起房子来了,这个倒使我想起了小时候我母亲跑单帮的事,只是刘伟军比我母亲幸运,他现在不用偷偷摸摸地“跑单帮”了,也不必担心有人冲着他喊:同志们捉牢伊,投机倒把贩卖拉斯蛤把……

我就对他说:“你是幸运的,从做黄牛到倒爷,就是一个跨越。如果你是牛,现在还摆个箩筐我也就理解你的,但做爷了,就该有爷的样子,左手提着鸟笼,右手攥着老核桃,去城隍庙的湖心亭喝喝茶那有多好?为啥还要摆箩筐呢?”

他对我说:“阿妹,依的话就是开坏我了,大家都知道,我是黄牛出身,黄牛呀,做胚一个,劳碌命了。再说,这个箩筐是我的发家史,哪怕今后我能坐上飞船上了宇宙,我也要背着我的箩筐上天。人啊,是不能忘了发家史的。”

和刘伟军的谈话很愉快,临分手时,他把光头伸出车窗对我叫道:“快眼把美金抛掉,现在还是七点几,再过几年就要跌到六了。”

真不知道这个刘伟军是乌鸦嘴还是他对经济形势的认识深刻,果然美金跌穿过六元人民币。唉,现在想想有点后悔,居然没有听他的话。

不是我没有听他的话,是不相信黄牛,你刘伟军再怎么牛,在我们的眼中,总是属于不正当的职业。就如当初母亲和阿姨跑单帮一样,让我胆战心惊。但上海的黄牛们仍然很活跃,并在夹缝中生存,以他们顽强的生命力,演绎着每个时代的故事。